

《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辨析*

周 岷 周及徐

(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 要: 英国传教士钟秀芝的《西蜀方言》所记 100 多年前的成都话, 与今天的成都话音系相比较有较大的差异。而同一时代的另一些传教士所记成都话, 则与今成都话基本一致。那么百年前成都话语音究竟如何? 学界几十年来一直争论不休。通过对原书及其同类著作的分析, 我们破解了这一谜团: 钟氏所记成都话音受当时流行的《五方元音》等韵书的影响而形成一些语音假象, 现代成都话与百年前并无大的差异。又, 方言调查表明成都地区并无一套与本地方言不同的“雅言读书音系统”。今存的成渝地区两大方音系统——南路话和湖广话: 前者来自明代以前四川本地方言的传承, 后者来自明清湖广移民。

关键词: 《西蜀方言》; 《五方元音》; 注音模式; 南路话; 湖广话

—

由于汉字记录语言的特殊方式, 汉语方言在某一特定阶段的语音成为汉语语音史研究的难题。甚至于探讨仅仅百年前的官话方言成都话的语音也成为难事。而百余年前来到中国的西方传教士用罗马字母记写汉语方

* 项目基金: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嘉陵江流域方音字汇——20 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二”(项目编号: 20FYB039)、四川省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方言与地域文化研究”成果。

言音，看起来近于记录音位，颇合现代语言学的法眼，被奉为考察近现代方言语音史的珍宝。百年前英国传教士钟秀芝（Adam Grainger）的《西蜀方言》就记录当时的成都话。可是一看钟氏所记，我们却傻了眼，竟然与今天的成都话^①很不相同。零碎的不算，仅从大的特点说，钟氏记成都话音就有尖团分音、平翘舌分音和入声调，而这三者在当代成都话都是没有的。

于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很多学者就《西蜀方言》展开了讨论。综合有关研究，可将其观点分为四大类：

第一，一部分学者认为《西蜀方言》所记为一百多年前成都话音系，如甄尚灵（1988：209—218），周赛华（2013：155—160，170），范常喜等（2016：55—62），袁雪梅等（2020：167—174）等，当代成都话音系和《西蜀方言》所记音系为历时演变关系。

第二，一部分研究对《西蜀方言》所记是否为一百年前的成都话音系持保留态度。例如日本学者千叶谦悟，他认为“钟秀芝没有明确说明《西蜀（方言）》是关于成都方言的字典……而且《西蜀（方言）》的标题是‘Western Mandarin’，所以不能臆断为纯粹的成都话”。（千叶谦悟2008：433）

第三，一些学者发现《西蜀方言》所记音系不同于当代成都话音系，其中有学者认为这种差别是由于其所记音系为成都及其周边多种方言混合而成的。持这种观点的有：彭金祥（2008：70—73），黄灵燕（2010：402—415）等。

第四，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清代末期成都话很可能并行雅、俗两套口语音系，《西蜀方言》反映文雅口语音……”（曾晓渝2018：263），当代成都话音系是对当时通俗口语的保留，而口语雅音则随着科举制度的取消和新文化运动兴起等一系列历史事件而消失。

以上后三种观点都是不认同“《西蜀方言》所记为一百多年前成都话音系”而另寻解释。其原因是基于一个很明显的事实：《西蜀方言》所记音系具有入声独立、声母分平翘、分尖团等特点，而根据20世纪40年代

^① 当代成都话音系参见杨时逢（1984：11—26）、周岷（2017）、周及徐等（2019：13—14）。

的调查^①，成都话入声混入阳平、不分平翘、不分尖团，与当代成都话一致。难道从1900—1940年前后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成都话音系就能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

二

如前所述，20世纪初的成都话不可能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发生音系上巨大的变化，这不仅是理论上的推想，也有实际的语言调查（参见后文第四节）。《西蜀方言》所记成都话音系与实际成都话音不同，主要是由当时的记音模式所致。本节通过整理《西蜀方言》所记音系的声母系统和声调系统，对该书的记音模式做全面分析，并解释其所记音系与当代成都话音系的真实关系。

通过观察《西蜀方言》的声母记音模式，“虽然作者未作说明，但是通过分析全书的拼写系统发现，部分罗马字代表了两套不同的声母”（周岷 2017：137）：《西蜀方言》用罗马字母 Ch 记 [tʂ-] 和 [tʂ'-] 两个声母，用 Ch' 记 [tʂ^h-] 和 [tʂ^h'-] 两个声母，用 Sh 记 [ʂ-] 和 [ʂ'-] 两个声母。因为 [tʂ-] 组只和开口呼和合口呼相拼，[tʂ'-] 组只和齐齿呼和撮口呼相拼，故能将二者合并为一类符号。根据《西蜀方言》的音节索引，参照甄尚灵（1988：212）、千叶谦悟（2008：444）、周岷（2017：137）等人的结论，我们构拟出《西蜀方言》音系中所包含的声母共 23 个（含零声母），如表 1 所示：

表 1 《西蜀方言》声母表（罗马字记音，国际音标及例字）

P [p] 巴败八	P' [p ^h] 攀爬撇	M [m] 吗面麦	F [f] 方虎法	
T [t] 打待特	T' [t ^h] 他停踢	L [l] 来脑		
Ts [ts] 灾责摘，尖即	Ts' [ts ^h] 猜促愁，秦七		S [s] 萨俗，西夕	
Ch [tʂ] 渣站捉	Ch' [tʂ ^h] 叉闯出		Sh [ʂ] 沙尚舌	R [ʐ] 然锐，儿
Ch [tʂ'] 家儿脚	Ch' [tʂ ^h '] 期讲曲	N [n] 泥严	Sh [ʂ'] 希许学	
K [k] 干跪国	K' [k ^h] 看苦葵	Ng [ŋ] 熬挨，宜	H [x] 哈鞋或	
Ø 阿哎依娃雨月				

注：表中逗号后的例字为声母读法与今成都话不同的字。

① 40年代成都话语音调查记录参见杨时逢（1984：11—26）。

表1所显示出的《西蜀方言》声母系统有以下特点：第一，《西蜀方言》对古精组字声母记音为 Ts, Ts', S, 如“灾 Tsai, 猜 Ts'ai, 萨 Sa”等；对古知系字声母记音多为 Ch, Ch', Sh, 如“渣 Cha, 叉 Ch'a, 沙 Sha”等。表现出记音分平翘舌。第二，《西蜀方言》古精组细音字声母仍记为 Ts, Ts', S, 如“即 Tsi, 秦 Ts'in, 西 Si”等；而古见组细音声母则记为 Ch, Ch', Sh, 如“几 Chi, 期 Ch'i, 希 Shi”等，与大多古知系字声母共用，如“Ch 渣, Ch' 叉, Sh 沙”等。从这套记录来看，精组洪音字与细音字用了一套符号，与见组细音字不同。于是很多学者解读为该音系分尖团。但是，见组洪音字与见组细音字则用了两套符号，说明见组细音字很可能已经腭化了，这 and 现代成都话一致。而见组细音字声母与知系字声母在现代成都话中则是完全不同的，在当时的语音中也不大可能相同，而钟氏却用了相同符号 (Ch) 记音。那么，精组细音字用了与精组洪音字相同的符号 (Ts)，有没有可能，与知系、见系细音字用同一套符号 (Ch) 一样，使用同一套符号 (Ts) 的精组洪音字和细音字实际上也是两种不同的读音呢？第三，《西蜀方言》对古疑母细音字，如“宜、仪、蚁”等声母记为软腭鼻音 Ng [ŋ]，这是依从古声类，现代成都话疑母细音字与泥母细音字同读 [n]，与之明显不同。第四，对古止摄日母字，如“儿、二、耳”等声母记音为 R [ʐ]，这也是依从古声类，这些字在现代成都话中读零声母，与大多数官话方言一样。

对比同时期其他传教士所记音系，艾约瑟 (Joseph Edkins) 在 1864 年出版的《官话口语语法》(Edkins 1864) 所记以成都话为代表的西部官话声母系统也分平翘舌，如“色”记为“se”，“舌”记为“she”。然而，该书明确指出成都话不分尖团：

In *Western Mandarin*, taking C 'heng-tu-fu the capital of Sī-c 'hwen as the standard...The same law exists for the initials *h* and *k*, as in northern mandarin. Before the vowels *i*, *ü*, they coalesce with *s* and *ts*. (Edkins1864: 9)

(在西部官话成都府话中……如同在北方官话中一样，同样的规则存在于声母 *h* 和 *k*，如果在元音 *i*, *ü* 之前，它们与 *s*、*ts* 合并了。)

这是“百年前成都话不分尖团派”的证据。

启尔德 (Omar Kilborn) 在 1917 年出版的《华西初级汉语课程》(Kilborn 1917) 所记音系的声母特点和《西蜀方言》基本一致, 也分平翘舌, 如“坐”记作“DZO⁴”, “张”记作“DJANG¹”。也分尖团, 如“进”记作“DZIN⁴”, “今”记作“GIN¹”, 古精组和古见系细音字用不同符号记录其声母。这又是“百年前成都话分尖团派”的证据。钟氏、启氏与艾氏, 二比一。我们将上述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的声母特点对比如下:

表 2 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声母特点对比

记音人 特征	艾约瑟 (1864)	钟秀芝 (1900)	启尔德 (1917)
是否分平翘	+	+	+
是否分尖团	-	+	+

需要指出的是, 虽然钟秀芝和启尔德对尖团音的处理方式有区别, 但是其所记实为同一套系统: 即古精组细音字与见组细音字区别。启尔德用 DZ 记录 [ts], 用 G 记录 [k], 古精母细音字如“进”记作“DZIN⁴”, 古见母细音字如“今”记作“GIN¹”, 让人觉得这两组字均未腭化。但是其对溪母细音字的记音又用了记录 [tʂ^h] 声母的符号 CH, 如“去 CH-”, 并没有用记录 [k^h] 的符号 K; 对晓匣母细音字的记音又用了 Hs, 如“兴 Hs-”, 也没有用记录 [x] 的符号 H。当时的成都话不会有见系细音字尚不腭化的现象 (艾氏钟氏都不反映), 为何启尔德记“今”音为“GIN¹”呢? 由此可见, 启尔德所记声母所体现出的尖团音分化情况也可能是依从古声母分类。

通过对比, 我们提出一个问题: 艾约瑟的《官话口语语法》成书于 1864 年, 但是其书中所记成都话音系声母已经尖团合流, 而此后钟秀芝和启尔德所记音系声母却分尖团, 20 世纪 40 年代《四川方言调查报告》所记成都话音系又不分尖团, 为什么?

有的学者也曾发现过类似问题, 如庄初升等就曾指出, “像古见、晓组细音字的声母《华西官话汉法词典》(1893) 记录为 k, k', h, 与洪音字的声母不分, 但是相隔不到 10 年, 《西蜀方言》(1900) 记录的细音字的声母为 ch, ch', sh, 洪音字的声母维持 k, k', h, 到底是实际语音发

生了演变，还是拼音方案因循守旧所导致？”（庄初升，阳蓉 2014：126）

20 世纪初西方传教士的记音真能反映当时成都话的实际音值吗？从明朝的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开始，到威妥玛式、邮政式、EFEO（法国远东学院汉语记音）等，再到国语罗马字、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一直到 1958 年汉语拼音方案的颁布，不管是西方传教士还是国内语言工作者先后为汉语制订过几十套注音方案。仔细观察并对比这些方案对“尖团音”的处理，我们可以将这些方案分两类。

第一类：记音方案能体现出尖团音的区别。属于这类记音方案的包括《西儒耳目资》（1626，1957）、邮政式、EFEO、国语罗马字新方案、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值得注意的是，根据赵元任的回忆^①，其在 20 世纪 20 年代曾制定过两套国音（kuo-yin）系统。其中第一套系统保留有尖团音和入声调的分别，以包括更多的汉语方言的特点，使全国各地、无论南北地区的人都易于通用。第二套系统才采用了没有尖团音区别和入声调的北京（当时称北平）语音系统。后来的国语罗马字新方案以及北方拉丁化新文字等虽然都是对第二套系统（北京语音）的注音，却都体现了尖团音的区别及入声声调。由此可见，上述方案的特点是不论口语中尖团合流与否，统统按照汉语历史音韵类别，将古精组细音字和古见系细音字用两套声母分别记录。

第二类：记音方案不体现出尖团音和入声调的历史区别而按实际语音记音。属于这类记音方案的如第二套国音系统（1921 年制定，1928 年颁布）和汉语拼音方案（1958 年颁布）。这类方案的特点是按实际语音（北京音）的音位记音，既然所记音系已经发生了尖团合流，就按照实际发音将古精组细音字和古见系细音字用同一套声母记录。这是彻底地贯彻了现代语言学记音方法。

如果说成都话在 1864 年以后走了回头路，再把已经相混的见组和精组细音字，以及并入阳平的古入声字重新分出来，这在方言的实际发展上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们分析，艾约瑟与钟秀芝和启尔德的记音在尖团音问题上的差异，应是由其记音模式的不同造成的：钟秀芝、启尔德等人采用了上述第一类方案，而艾约瑟采用了按语音实际记音（上述第二类方案）。依艾约瑟的记音，精组细音字与见组细音字在当时已经成为一类（已发生腭化成为龈腭音），钟秀芝和启尔德却从中分出已经腭化了的精

^① 参见 Rosemary Levenson（2009：86—92）。

组细音字，他们是如何做到的？

这个今人看来的难题，在当时并不难。这就是参照当时流行的中国韵书。

三

清代以来有一部影响全中国的韵书《五方元音》（1653，1710），其作者是河北邢台隆尧县的樊腾凤（1601—1664年）。樊氏书有别于古音韵诸书，创造性的改用十二个韵母和二十个声母来拼写当时的汉字音。樊氏的家乡在今北方方言区冀鲁官话次方言区的石济片，《五方元音》的音系不仅有人声，还区分尖团音。樊书用音序查字，比旧韵书易于查阅，今人用起来很方便。此书清顺治十年（1653）初版，后来受到康熙皇帝的赞赏而天下皆知。约1680年后，书商在上海石印翻印。此书自清初首发到民国三百年间，国内图书行业都争相印刷，发行国内外。当时因此流行“有字无音查《字汇》，有音无字查《五方元音》”的俗语。《五方元音》在清代和民国初期盛行全国，当然也影响了早期来华的传教士，他们学习汉语、编写汉语字典和汉语教科书，此书都是重要的参考。所以，传教士们要查询汉语方言中已合并的更早阶段的语音系统，例如尖团音字的区别、入声字的区别等，参阅《五方元音》之类的书是很方便的。我们常惊异外国传教士学习汉语的天才能力，原来这里也有汉语近代韵书的功劳。

据清代年希尧刻《重校增补五方元音全书》（1710），《五方元音》的二十个声母是：（国际音标为本文作者所加）

榔 [p-]、匏 [p^h-]、木 [m-]、风 [f-]；

斗 [t-]、土 [t^h-]、鸟 [n-]、雷 [l-]；

竹 [tʂ-]、虫 [tʂ^h-]、石 [ʂ-]、日 [ʒ-]；

剪 [ts-]、鹊 [ts^h-]、系（丝）[s-]、云 [0-]（云下例字：因言氲元）；

金 [k-]、桥 [k^h-]、火 [x-]、蛙 [0-]（蛙下例字：文晚恩安）

按：原书每个声母下有二至四个代表字。“剪”下有例字“精尖尊钻”，故可以定为声母 [ts-]。“系（丝）”下有例字“新先孙宣”，故可以定为声母 [s-]。“金”下有例字“京坚根千（干）”，故可以定为声母

[k-]。“火”下有例字“兴轩昏欢”，故可以定为声母 [x-]。其余字母皆可类推。由于本文论题，我们只讨论“剪”“金”两系，即精见两系。

很显然，《五方元音》所记音系是分尖团的，因有“剪鹊系（丝）”“金桥火”，即精见二系。但是请注意见系细音字，早在十三世纪的北方方言中它们就已经腭化了，十七世纪的冀鲁官话中“金京坚”的声母怎么可能还是与“根干”一样的 [k-] 呢？毋庸置疑，樊氏不是百分之百的记写当时的一方之音的，他既在大北方官话的基础上归纳今音，又兼顾了古音系统。中国传统的音韵学经常是古今八方兼容，不然算不上“天下通语”，所以叫“五方元（原）音”。同样的理由，“剪鹊系（丝）”的细音是 [ts-]、[ts^h-]、[s-]，也已经腭化了。樊氏可能是兼顾到“剪鹊（丝）”与古声母与“尊村孙”同类而归为同一类的。这样，既通古音又无碍今音。樊氏的这个广泛概括官话音系特点方法，被后来的一些初涉汉语的洋人传教士如钟秀芝、启尔德之类奉为圭臬。不然，传教士刚到中国数年，汉语尚不熟悉，更遑论尖团平翘、入声归派，就能写出中规中矩、古今音皆通的汉语语音字表？所以，钟秀芝、启尔德在成都话记音中表现出来的分尖团现象，应是依循古音分类造成的假象。当时的成都话中，不但见系细音字早已腭化，精组细音字也已经腭化了。（见后文的方言实际材料）

艾约瑟的《官话语法》（1864）引《五方元音》并作了构拟，如下：

16 *Five tone mandarin initials.* Another system extensively known is that of the dictionary *Wu-fang-yuen-yin*, by a native of Yau-shan, or what is now called T'ang-shan, in the southern extremity of Peh-chi-li, the metropolitan province. It consists of the following characters 20 in number, read from right to left.

金,kin,	剪 'tsien,	竹 chuh,	斗 'teu,	梆 ,pang,
橋 .k'iau,	鹊 t'sioh, (c'hiau),	虫 ,c'hung,	土 't'u,	匏 p'au',
火 'ho,	系 hi' (s),	石 shih,	鳥 'niau,	木 muh,
蛙 ,wa,	雲 .yün,	日 jih,	雷 .lui,	風 ,fung.

图1 《官话语法》截图一《五方元音》声母 (Edkins1864: 38)

艾氏除《五方元音》之外，又引用了记录当时北京语音的《李氏音

鉴》(李汝珍 1810)。下面是艾氏所引:

15 Peking Initials. There are several systems of initials for the mandarin language formed by Chinese authors. In the work called *Li-shi-yin-kien*, by a native of Peking, many of these are given. The author's own consists of 33 characters, viz.

箇 ko',	對 tui',	博 po',	松 ,sung,	醉 tsui',	鬱 .lwan,
空 k'ung,	陶 .t'au,	盤 .p'an,	仙 ,sien,	翠 t'sui',	漣 .lieu,
鷗 ,ngeu,	嫩 num',	滿 'man,	水 'shui,	酒 'tsieu,	堯 .yau,
鷺 ,king,	蝶 tiéh,	便 pien',	然 .jan,	清 ,t'sing,	粉 'fen,
溪 k'i,	天 ,t'ien,	飄 ,p'iau,	中 ,chung,		紅 .hung.
	鳥 'niau,	眠 .mien,	春 ,c'hun,		翹 .hiuen.

图2 《官话语法》截图二《李氏音鉴》声母 (Edkins1864: 37)

北京人李汝珍的《李氏音鉴》的音系是分尖团、分平翘舌、有入声的。作者当然知道当时的北京话尖团音和入声调已经消失了,但是为了“兼列南北方音”以包揽更广泛的汉语方音,作者有意这样做。作者在书中“南北方音论”说:“北音不分香厢、姜将、羌枪六母。”据此李氏的33声母可以简化为20个声母。这个系统比今天的普通话多一个声母“鸥”[ŋ-]。^①如果我们看这个音系表,也会被误导为分尖团的音系。

甚至,艾氏自己的官话音系声母系统也是如此:

該 ,kai, ought.	開 ,k'ai, to open.	哀 ,ngai, to grieve.
底 ti, bottom.	體 't'i, body.	你 'ni, you.
步 pu', step.	普 'p'u, the whole.	墓 mu', a grave.
方 ,fang, square.	荒 ,hwang, desolate.	秀 ,sieu, elegant.
收 ,sheu, gather in.	然 .jan, thus.	走 'tseu, to walk.
秋 ,t'sieu, autumn,	周 ,cheu, all round.	抽 ,c'heu, draw out.
樓 .leu, upper room.	兒 .rī, son.	彎 ,wan, to bend.
憂 ,yeu, sad.		

图3 《官话语法》截图三“北方官话音系声母系统”(Edkins1864: 1)

① 普通话另有 [tç-] [tç^h-] [ç-] 3个声母,加零声母共22个声母。

艾氏的 22 个声母，几乎与李氏简化后的音系一样（只多了两个声母“儿弯”），也分尖团。但是艾氏在论述“西部官话，四川省标准语成都府话”时明确地说：“……在北方官话中，有相同的规则存在：h 和 k 在元音 i 和 y 前，与 s 和 ts 合并为一类。”（Edkins1864：9）

通过对比分析艾约瑟、钟秀芝以及启尔德在尖团音问题上的记音分歧，钟秀芝和启尔德应是采用了与《五方元音》类似的记音法，而艾约瑟则根据当时成都话口语的实际语音特征做出了说明。三者在他们的著作中的音系表和字表上看起来，都是分尖团的。

另外，还有声母分平翘舌的问题。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都体现出平翘舌的区别，这与 20 世纪 40 年代《四川方言调查报告》对成都话的调查和现在成都话的情况不一致，二者中古知系字都读平舌音。我们认为钟秀芝在记音时也采用了与《五方元音》类似的记音法，从古音系统的知系字分出了翘舌音，这与从古音系统中分出尖团音和入声调的做法相一致。（《西蜀方言》以古音分声类的更多证据，见本文第四节末）。或者，钟秀芝得到精通韵书的中国人的帮助，形成了与汉语古音系兼容的“成都话音系”。但我们目前没有这方面的证据材料。

四

《西蜀方言》的正文和音节索引部分每个字后有罗马字注音，汉字右上角的数字表示声调，如：

Ma. 吗¹ 麻² 马³ 骂⁴ 抹⁵

由此可见，右上角的数字表示调类，《西蜀方言》所记音系共包含 5 个调类，分别对应阴平、阳平、上声、去声以及入声。而 40 年代《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记录的成都话只有 4 个声调，入归阳平。钟秀芝在《西蜀方言》的前言部分有这样一段描述：

The 5th tone is sometimes difficult to distinguish from the 2nd, being less abrupt than the 5th tone in Southern Mandarin. Still, it is a distinct tone and is not confounded with the other four tones as in Northern Mandarin. (Grainger1900: Introduction ii)

（第五声有时难于与第二声分辨，它不像“南方官话”第五声那

样短促，但毕竟自成一个声调，不像“北方官话”已混入另外四个声调之中。)

这段文字告诉人：钟氏此前已知其他“南方官话”中的入声调系统，并极力要在成都话中去落实，但是“有时难于与第二声分辨”。这里的“第二声”即是指成都话阳平调，入声并入阳平调这是现代成都话和大部分西南官话的特征，可见当时已经存在了。而钟氏却要力图把它分辨出来，以合古音。几乎同时，启尔德在《华西初级汉语课程》中记录成都话却只有四个声调，并且在前言部分有这样一段论述：

West China is supposed to have five tones; and for many parts this is quite true. Other places — including Chengtu and Chungking have only four, for the second and fifth are synonymous. A Chengtu man finds great difficulty in distinguishing a fifth tone. I have therefore ventured to follow the language of Chengtu and Chungking by indicating four tones only, doing away with the fifth, and placing all these under the second. (Kilborn 1917: Introduction VI)

（中国的西部方言应该有五个声调；很多地方的情况确实也是如此。其他地方，包括成都和重庆，只有四个声调：因为第二调和第五调非常相似。成都人很难分辨出第五调。因此我们姑且认为成都话和重庆话只有四个声调：忽略第五调，将其全部列入第二调。）

“成都人很难分辨出第五调”，这是对当时成都话调位情况的实际描述。

在这之前，艾约瑟在《官话口语语法》中记录成都话也只有四个声调，入声字读阳平。艾约瑟对成都话声调的记述如下：

In Western Mandarin, taking C‘heng-tu-fu the capital of Si-c‘hwen as the standard, there are four tone-classes; they are the first, second, third and fifth. Words originally in the fourth or short tone-class, are here found to be all in the fifth... (Edkins 1864: 9)

（成都作为四川首府，成都府话在西部官话中被当作标准语，有

四个声调类，它们是第一、第二、第三和第五调，原在第四调或短调类中的词进入了第五调^①。

我们将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的声调情况列表对比：

表 3 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声调对比

记音人 声调特征	艾约瑟 (1864)	钟秀芝 (1900)	启尔德 (1917)
调类数	4	5	4
有无入声	无	有	无

与前面的尖团合并又重分的情况相似，我们很难用语音的历时演变来解释：为什么 1864 年的记录成都话已经没有入声，到了 1900 年又出现了入声，而仅 17 年后入声又再次消失？这些操印欧语的外国人学习汉语，因他们自己的母语无声调而辨调能力有限，连成都本地人尚不能分辨的阳平调中间包含的入声字，他们是如何分出来的呢？

钟秀芝记录的“成都话入声调”也是《五方元音》模式作用的结果。《五方元音》代表了十七世纪中叶的北方方言语音系统（陆志韦 1948：1—13，龙庄伟 1989：77—81，李清桓 2008），该书对明清时期来华传教士编纂汉语词典产生过重要影响（汪银峰 2020：429—435）。十七世纪北方方言语音系统中的入声已经消失，但是该书所记音系中却整齐地保留了入声。龙庄伟认为“《五方元音》的入声是作者泥古的反映。《五方元音》上平、下平、上、去、入 5 个调类，不是当时语音的真实记录，《五方元音》音系中入声已经消失。”（龙庄伟 1989：81）

所以，从上面引用的前言可以看出，无论是钟秀芝还是启尔德在描写西部官话的声调之前都已经预设其“应该有五个声调”，不同的是：钟秀芝按古音系统从成都话中分出入声字；而启尔德却忠实于成都和重庆的方言事实入声与阳平为一类。综上，我们可知三位传教士所记音系其实均无入声，在艾约瑟记音之前，成都话和川北、川中和重庆等地方言中，入声就已和阳平为一类，有众多的资料可证。可以看出，启尔德在成都话的声

① 按：艾氏的第五调指成都话的阳平调，第四调指成都话的入声调。

调处理上是纪实的，而钟氏在《五方元音》模式和其他“南方官话”的语音系统影响下先入为主，使成都话有了入声。

综上所述，无论是声母系统还是声调系统，钟秀芝都采用了以《五方元音》为代表的“依古音分类法”，或许这种记写汉语音系的方法在当时教会中流行。这导致《西蜀方言》音系和几十年后的成都话有明显区别，造成了成都话语音在短短几十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并且走回头路的假象。

我们还可以在《西蜀方言》中找到“依从古音分类”的同类的线索。在《西蜀方言》的音节表中，“儿、而、耳、二、贰、日”等字的读音都被记为 Rr。若根据《西蜀》的记音符号与国际音标的对应，这几个字的读音都应为 [zɿ]，这与成都话实际读音（除“日”字外均为零声母）相差甚远。但《西蜀方言》的这个记音，符合于汉语历史语音的声母分类，这些字都属于“日母”（与《五方元音》同），也符合于一些汉语方言中这些字为同一音类的格局，例如吴语。作为一个外国传教士，钟秀芝是难以了解汉语方言之间的这种语音对应关系的，他可能从《五方元音》或同类的韵书间接地得到这方面的材料，从而得出北方方言中区别甚大的这两类音“而”（零声母）“日”（z 声母）是一类音，与一些南方方言相同。又如，《西蜀方言》对“宜、仪、蚁”等声母记为软腭鼻音 Ng [ŋ]，这些字都是古疑母细音字，这样记音同样符合于汉语历史语音的声母分类，但是与成都话实际读音不一致。再如，甄尚灵曾提到，《西蜀方言》音节表中的例字“有三项照顾古音音类的分合”（甄尚灵 1988: 211）：第一，古来母和古泥（娘）母字分列，而古来母和泥母洪音字在成都话中是合并为 [n] 的；第二，古疑母和古泥母分列，而古疑母和泥母细音字在成都话中是合并为 [ŋ] 的；第三，en [ən]、in [in]、üin [yn] 三韵先列古 [-n, -m] 尾例字，再列古 [-ŋ] 尾例字。而古韵中 [-en] 与 [-eŋ]、[-in] 与 [-iŋ] 相混为 [-en] [-in]，这些是四川地区方言（包括成都话）的普遍现象。所有这些钟氏竟能分开，其实都是依从前一阶段的古韵类做到的，并不是实际记音。

这些证据提供了更多的证明，说明《西蜀方言》所使用的记音系并不是对当时成都话的纯粹的平面音位描写，而是参照了近代的古音系统分类，从而在尖团音、泥来母、入声调等问题上造成了音位分立的假象。

五

我们近十余年的方言调查（周及徐等 2019）表明，除了少量的文白读音字外，成都地区并无一套与本地方言不同的“雅言读书音系统”。今存的成渝地区两大方音系统——南路话和湖广话：前者来自四川本地方言的传承，后者来自明清湖北移民（周及徐 2012a：94—101，2012b：65—77，2013：52—59）。

（一）“文雅口语音”的问题

本文第一节提到，一些研究者对《西蜀方言》所记音系与现在成都话音系不同的情况，提出各种解释。其中，曾晓渝提出清末的成都口语存在“文雅口语音”现象，并指出，“……就各地官话口语音而言，一直存在文雅音与通俗音的双重性。成都历史悠久，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社会生活中以雅音读书、交流，既为文人所推崇，也为老百姓认同……”（曾晓渝 2018：272）

笔者一家四代是都成都人。笔者之一的祖母（1900—1995）终身生活于成都，一口地道的成都话（湖广话），没有尖团、平翘舌和入声调。老祖母就一种口语，不知有“读书音”。母亲（1927—1990），也是一口同样的湖广话。她于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就读于成都师范附属小学（今成师附小）和四川省立女子中学（今成都七中），学校教书用成都话（即湖广话），不能分辨平翘舌字和入声字，更不用说尖团音，也没有过什么“雅言读书音系统”。笔者之一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就读于成都市中心的小学（“一师附小”）和中学（“成都十中”）。当时有的老师不熟悉普通话，用成都话讲课，学生也接受无碍。20 世纪八九十年代，位于成都的四川师范大学的校园内通行的不是普通话，而是成都话。一年级入校的学生不管他们来自何方，四年后毕业，操一口地道的成都话。成都话口语与官话系统高度沟通，不用像一些南方方言一样，在实际交流中需要一套文读系统来辅助，这是成都话中的文白读区别大大少于一些南方方言的根本原因。我们是 21 世纪的成都人，是相信我们自己亲历的语言事实，还是相信百年前外国传教士留下来的不确切材料？这些本地方音的实际经历和记忆，完全不同于《西蜀方言》所记的分尖团、分平翘、有入声的“成都

话音系”。而为之作解说成都话“口语分雅俗两套”的说法，是一种并不存在的理论上的推想。或者说，这种“雅言系统”只存在于纸上，如《西蜀方言》，不存在于实际的口语。《西蜀方言》的语音系统的一部分是据古音推导出来的，因而是虚假的，不符于20世纪初的成都话音。但由于上述的种种原因，它给予我们很大的误导。

曾晓渝（2018：272）认为，清末西方来华传教士所学应为当地方言的“雅音”层次，“《西蜀方言》的语音受中国文人传统‘正音’观念影响……专门教授钟秀芝四川官话的老师是谁不得而知，但肯定是位四川知识分子……所以，《西蜀方言》不以成都通俗口语音为标准。”不知名的“四川知识分子”用雅音教授传教士，这一共就有好几层推想，难以作为语言考察立论的依据。

所谓“文雅口语音”到底是什么呢？“文雅口语音类似大邑、蒲江话，即入声调独立，声母分平翘、分尖团音，《西蜀方言》倾向于记录文雅口语音……”（曾晓渝 2018：270）理由是保留入声，声母分平翘、分尖团的口语更接近中古音系，当时社会的上层和知识分子为了写文作诗需要，讲的都是这套口语；而社会下层和普通老百姓讲的是入归阳平、不分平翘和尖团音的“通俗口语”。首先，成都地区方言的情况是方言以地域而分，成都市区人只讲一种方言（无人声的湖广话），大邑、蒲江、崇州、都江堰等地居民也只讲一种方言（有人声南路话）。今大邑、蒲江话保留入声，但是并不分平翘和尖团^①。其次，这与当代成都及周边的居民对这两种话所谓“雅俗”的认定恰好相反。一直以来，成都市区与周边的大邑、蒲江、崇州、都江堰等地居民很清楚他们的方言与成都话之间的语音差异（这是一种地域差异，见图4），并认为存在于大邑、蒲江等地的话显得土俗，都以成都湖广话为一方雅言。这些地方的居民来成都学习和生活都要学习更高雅的成都话，以免被人笑话为“乡巴佬”。难道短短几十年人们对“雅俗音”的认定就发生了颠覆性的变化？而事实上，所谓“通俗口语”当代成都话（即湖广话）在成都的远郊及周边地区，如邛崃、崇州、大邑、都江堰、蒲江等地，从来也不曾存在过。这些地方自明清以来一直只讲一种与成都话迥然不同的带有入声调和入声韵的方言，这就是川西民间广泛存在的“南路话”。

① 大邑、蒲江等地音系特点参见周及徐等（2019：26—27，32—33）。

(二) 所谓“雅俗口语”的区别实际上是地域方言的差别

现代成都话与“成都的远郊及周边地区”(实际上是成都西南面,见图4)的方言语音差异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

根据周及徐(2012a: 94—101, b: 65—77, 2013: 52—59),周颖异等(2013: 171—224),杨波等(2015: 328—343),周岷等(2016a: 23—26, b: 166—172),周及徐等(2017: 62—69, 2019: 54—58),大量田野调查事实和研究结果表明:当代四川和重庆地区的存在两种分布区域和音系特征都不同的方言——湖广话和南路话。湖广话具有入归阳平、大多数不分尖团、不分平翘等特点,主要分布于岷江以东以北的广大的四川重庆地区。南路话具有入声独立(部分地区入归阴平或去声)、不分尖团和一部分地区分平翘等特点,主要分布在岷江以西以南的四川大部分区域和重庆南部地区以及贵州省北部地区。二者的地域分布泾渭分明。就音系特征而言,湖广话和南路话属于两个不同的历史层次。湖广话是明清“湖广填四川”移民带入四川地区的,南路话则是元末之前就存在于四川地区的土著方言。从历史上看,南路话在四川的历史比湖广话要长远得多,且多主要分布在川西南农村。这是湖广移民潮主要波及川中东部地区,较少波及川西南地区形成的。把“文雅口语”与偏处乡村的南路话相关联(因为假设它接近于钟氏的音系),而把“白话口语”与行于四川、重庆的大中城市的湖广话相联系,把两种分属不同地域、在地理分布上有明显界限的方言叠合起来作为一种“口语”的文雅两派,把不同的地域方言混同于同一地区的社会方言,这是不符合四川重庆地区的语言事实的。

所谓的两套“雅俗口语”实际上并不存在于同一地区,而是分布于不同的地区两套方言系统。这就是湖广话和南路话——成渝地区的两大方音系统。下图(图4)根据实地方言调查数据画出:成都地区位于湖广话和南路话的分界处,正好能看清两种方言的地域分界。

《西蜀方言》所记音系特点不符于当代成都话,用“文雅口语音”为其另找一出路,落实到南路话上。于是,南路话为文雅口语,成都湖广话为白话口语,把地域分布和历史层次混淆了。西南官话成渝片地区的居民

主要讲湖广话，西南官话灌赤片地区的居民主要讲南路话^①。这两种方言并不同时出现在同一个地区^②。人们要么讲南路话，要么讲湖广话，并以此区分人的来源地——“南路人”和“湖广人”。这怎么会是同一个成都话的“文雅口语”和“白话口语”之分？

六

我们认为，《西蜀方言》所记成都话音系与当代成都话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是它的记音模式造成的，并不是百年前成都话音系与当代成都话存在明显差别，成都话也没有在 20 世纪初的不到四十年的时间里发生如此大的变化。

本研究通过分析《西蜀方言》的声母和声调系统，重点考察了其音系中体现的尖团音分混问题以及入声独立等问题，并与同时期其他传教士对成都话音系的记录作对比，发现钟秀芝对当时成都话音系的记音在很多地方都兼顾了历史音类，不是对当时成都语音的语言学音位描写。传教士的汉语记音规则受清代《五方元音》之类的韵书的依古声韵类别记音的体系的影响，使 20 世纪初的成都话音系看起来与前后不久的记音都不相同。钟氏的记音让人误认为成都话语音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这不是《西蜀方言》误导了成都近现代方音史，而是我们对它的认识误入歧途。传教士们并不是现代语言学学者，并没有用现代语言学的音位描写法记音（虽然罗马字符号看起来像是）。相反地，他们倒是从中国传统音韵学著作中学到了概括汉语方音的办法。至于有学者又在钟氏记音的基础上推想出成都话中并不存在的“雅俗两套口语并行”，并把存在于另一区域的南路话看作成都话“雅言口语”，把不同的地域方言合并叠置，当作同一地域方言的不同社会方言，这不符合当地方言的事实。

补记：《成都通览》（傅崇矩 1909）是成都人写于 20 世纪初的反映成

① 西南官话“成渝片”和“灌赤片”等方言分区参考《中国语言地图集》（1987：B6）。

② 近年来，南路话地区的青年人学说成都话，那是强势方言的影响，是另一回事。参见周及徐等（2019：13—88）中的“音系说明”。

3. 何怡雯：《百年前的成都话语音——以〈成都通览〉等文献为语料》，硕士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21年。
4. 黄灵燕：《再论钟秀芝〈西蜀方言〉的人声和基础音系问题》，《语言科学》2010年第4期。
5. （明）金尼阁：《西儒耳目资（1626，上、中、下）》，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
6. 李清桓：《〈五方元音〉音系研究》，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7. （清）李汝珍：《李氏音鉴》，光绪戊子重修本，1810年版。
8. 刘振平：《汉语拼音经典方案选评》，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9. 龙庄伟：《〈五方元音〉音系研究》，《语言研究》1989年第2期。
10. 陆志韦：《记〈五方元音〉》，《燕京学报》1948年第3期。
11. 彭金祥：《略论近代四川方言的语音系》，《四川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12. 千叶谦悟：《〈西蜀方言〉与一百年前的四川方言音系》，《海外汉语探索四百年管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版。
13. 汪银峰：《〈五方元音〉与西洋传教士汉语教科书的编纂》，第二届汉语史研究的材料、方法与学术史观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汉语史与汉藏语研究》创刊四周年学术讨论会会议论文，2020年版。
14. （清）威妥玛：《语言自述集（186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15. 杨波、周及徐：《剑阁县金仙镇方言音系》，《语言历史论丛》第8辑，巴蜀书社2015年版。
16. 杨时逢：《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84年版。
17. 袁雪梅、邓英树：《〈西蜀方言〉音系性质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3期。
18. 曾晓渝：《〈西蜀方言〉的音系性质》，《方言》2018年第3期。
19. 甄尚灵：《〈西蜀方言〉与成都语音》，《方言》1988年第3期。
20.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等：《中国语言地图集》，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
21. 周辨明：《八年抗战中国语文国际化的进展：Q. R. 1937—45》，

国立厦门大学文学院 1945 年版。

22. 周及徐 A:《从语音特征看四川重庆“湖广话”的来源——成渝方言与湖北官话代点音系特点比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

23. 周及徐 B:《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语言研究》2012年第3期。

24. 周及徐:《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兼论“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语言研究》2013年第1期。

25. 周及徐、周岷:《〈蜀语〉与今四川南路话音系——古方言文献与当代田野调查的对应》,《语言研究》2017年第2期。

26. 周及徐等:《岷江流域方音字汇——20世纪四川方音大系之一》,四川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

27. 周及徐、周亚欧:《四川荣县话音系来源考察——明清“湖广填四川”的一项语言学证据》,《语文研究》2019年第4期。

28. 周岷、周及徐 A:《从明代〈蜀语〉词汇看四川方言的变迁》,《语文研究》2016年第3期。

29. 周岷、周及徐 B:《田野调查的新发现:四川巴州话——保存入声调的方言》,《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

30. 周岷:《当代成都话音系》,博士学位论文,四川大学,2017年。

31. 周赛华:《清代几种巴蜀方言韵书述要》,《长江学术》2013年第2期。

32. 周颖异、周及徐:《成都苏坡桥话音系及其在成都地区方言史上的意义》,《语言历史论丛》第6辑,巴蜀书社2013年版。

33.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版。

34. 庄初升、阳蓉:《传教士西南官话文献的罗马字拼音方案》,《文化遗产》2014年第2期。

35. EFEO Chinese transcription, https://en.wikipedia.org/wiki/EFEO_Chinese_transcription.

36. Environmental Systems Research Institute, Inc. *Arc GIS 10.2* (computer system), 2013.

37. Edkins, Joseph. *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anguage Commonly Called the Mandarin Dialect*,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4.

38. Grainger, Adam. *Western Mandarin, or, The Spoken Language of Western China*,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0.

39. Kilborn, Omar. *Chinese Lessons for First Year Students in West China*, Chengdu: The Union University, 1917.

40. Levenson, Rosemary. *Chinese linguist, phonologist, composer and author, Yuen Ren Chao*, Berkeley: 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9.

（周岷，男，副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及语言比较。通信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静安路5号四川师范大学巴蜀文化研究中心，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邮编：610068。电子邮箱：zmin@sicnu.edu.cn；周及徐，男，教授，博士，研究方向：语言学、汉语史。电子邮箱：zhoujixu@sicnu.edu.cn。）